

行者文丛

齊文化與齊長城

张华松 著

中國發射出版社

齊文化與齊長城



张华林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者文丛/孙国章、崔葦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11

ISBN 7-104-01232-X

I. 行… II. ①孙…②崔… III. 散文随笔—理论研究—文集 IV. J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500 号

行者文丛——齐文化与齐长城 张华松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山东和平印刷厂 印刷

200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7印张 2插页

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104-01232-X/C·50 总定价:206.00元

本册定价:14.50元

泰山名勝印譜

沙孟海題



安廷山 主編

序 言

徐北文

近年来，考古发现日益增多，在我国仅就新石器文化遗址来说，已是数以万计。这些遗址遍布于我国版图的四面八方。苏秉琦曾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它们分别是：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 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条块说》）。这是仅就人口密集地区划分的，并未包括新疆、西藏等地，若更全面地更细致地考察，就不是六大条块，而是“满天星斗”了。总之，这情况足以打破过去的以为中华文化以中原为中心，以汉族为中心，以王朝为中心的成见了。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是丰富多彩的。

然而这并非说在历史进程中，各地文化都齐头并进，平均发展。各地依其自有的条件自行起步，必然有先后之分、中心与边缘之别，当然在发展时也会有“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

► 齐文化与齐长城

东”的变化。进退生灭各自不同，从历代王朝首都的转移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研究中华文化形成的渊源时，要考察其主流与支流，地区的辐射力的大小强弱，看其中谁的作用最大。特别是中华文明奠基的先秦时代，理应纳入重点考察之中。“五四”以后，史学界对所谓夏商周三代的直线的传承观点已逐渐打破。在新石器晚期，中华大地上有两大文化重地即西部的华夏文化和东部的东夷文化。前者诞生了周王朝并上溯到夏朝，后者则孕育了殷商王朝并上溯到尧舜时代（按以前由于西周以来因中国首都长期在西安洛阳，从而掩盖下的东夷——齐文化的作用不为世所注意）。傅斯年最先明确地提出这一观点，经闻一多《龙凤》等一系列论著的发表，逐渐成为文史界的共识。

中华传统的主流学派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而又诞生于东周以后的西周文化传统重地的鲁国（原属东夷地区）曲阜。他提倡周礼而又服膺韶乐，被其门弟子称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儒家的产生是商周（东西）两大文化汇合的成果，此后形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骨干。春秋时期全国文化中心在鲁国，春秋以后随着齐国的富强，稷下学宫的建立，在东夷文化的软环境中，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使齐国取代了鲁国的中心地位。从此之后，我国学术的以儒家为主、诸子为辅的结构形成了。汉武帝以后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所谓“诸子百家”的齐学并未灭绝，而是改头换面融于儒学之中，甚至可以说汉代的儒术是鲁表齐里的齐学为主脑的新学派（先秦的儒家是邹鲁之学，汉代的儒家则是三齐之学）。总之，商周之学形成先秦儒家，齐鲁之学形成汉代儒家。齐学上溯至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古希腊是欧洲文明之源一样，齐鲁应是中华文明之主要源头。

汉代以后，长期以来对齐学重视不够，没有把它从鲁学之中分离出来予以考察。自清季公羊学派（今文学派）的兴起，才逐渐引起注意，但仍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以及从事更深一层的开掘。80年代末，齐文化学会编纂《齐文化丛书》，我忝参末议，结识了不少当代注意齐学的学者，在交流中，深感齐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我个人对它识见之浅薄。窃以为齐学虽是先秦时代各地文化之一，但它却是东夷文化的传承者，它在春秋为形成儒家而起作用，在战国成为诸子百家的发祥地；其后它又西进于秦地，不仅为《吕氏春秋》这一“百科全书”提供了基础，而且又影响了秦始皇的统一王朝的新制度的形成；在汉以后它又为儒家今文学派的建立做了重大贡献，同时又普及于百姓日常风习与宗教生活之中。凡此足以证明它的方面之广，潜能之大，渗透力之强。齐文化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太重要了。我不幸生不逢时，年甫三十即躬罹文网，其后又遭各种运动之打击，打入另册者凡二十四年。大难不死，待重展书卷时，惜乎垂垂老矣。故现已年过古稀，无所成就，虽私心翘盼齐文化研究日趋鼎盛，也只能借重同好诸君，尤寄希望于中青年朋友，为几近断绝几十年的中华学术的传承做出贡献而发扬光大。张华松君是同行中的少壮派，青年时期即有志于史学。他生于文登，就学于曲阜，执教于济南，可谓是在齐风鲁雨中茁壮成长的。他热心于齐文化研究，正是得天独厚，况且他又好学深思，孜孜不倦，著作不辍，殊为我们荒疏的一代老者所欣羨，所慰藉。

本书是张君近年论文结集，所考证研讨者大都是齐地的文史问题。在《齐地八主探析》、《古齐风尚简论》、《秦代的博士与方士》等文中深切揭示了齐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秦汉学术的影响。特别是结合本书中的《秦始皇东巡的原因与动机》和《秦始皇经营琅邪论略》等文的探讨，著者对齐学对秦制与秦汉学

► 齐文化与齐长城

术的重大作用的论证，在学术研究中是有开拓之功的。我们在《吕氏春秋》中可体会到齐学对秦地的巨大影响，如今张君又从而对秦始皇的与方士、博士的关系，东巡封禅及经营东方的深层原因——精神内涵的剖析，更可窥见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作用，还有人格和精神的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沿此出发，再作进一步探讨，将使历史研究别开生面，收到更大的效益。

汉代儒学既是鲁表齐里的齐文化的变相，纵使以后经过了古文学派的重新整合，又经过宋明理学的提炼升华，更多的保留了邹鲁先生的基因，去掉了一些稷下学士的杂质之后，齐学并未没落，而是在新儒学领域之外的诸方面体现出来。这表现在东汉以后的儒学在社会上层士大夫当中占有市场，而齐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家、方仙道乃至黄老——道家等，却在社会下层，百姓日用生活中，医卜星相中居于主导地位。保存于《管子》中的各篇文字，涉及方面是很杂的，各自起的作用也不一样。黄老之学——道家在后代又趋于两途，上者为哲学，下者为宗教迷信。阴阳五行学说则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上至秦皇汉武，下至巫婆骗子，流氓黑道，皆受其影响。总之，齐学的驳杂错综，几乎应有尽有，蕴含人类智慧的方方面面，即使神奇与腐朽共存，仍具有开发利用的多种资源和无限生机。试举一例：儒家的进取向上的精神，以为人类发展由乱世、小康，进而达到升平大同之世，钟情进步，渴望未来。这种直线向前的心态，一遇到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发展史的学说，更是兴高采烈，乘着“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奔向美好的新时代”，使我们的豪情奢望一发而不可收。但在二十世纪末叶，环保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后，就感到这种直线向前的轨道似的思维定势难于解决。这倒促使人们对于过去一味批判的“保守”观点进行反思。想起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崇尚自然

序言 ◀

的道家。想起了警惕“亢龙有悔”的《易》学（今按，《周易》爻辞在儒家形成之前）。想起了讲究阴阳消长，万物相生相克的邹衍的学说。这些齐学观点，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来说倒是一服清凉败火的良药，使躁狂的自大的妄称“征服自然”的我们镇静、清醒，提供了改善地球环境，医治人类痴迷于“明天拜物教”以及“恐旧趋新”的顽症的可能性的多种的选择余地。

张君年富力强，治学勤奋，为实地考察，曾利用暑假行走于千里绵长的齐长城遗址，结合古文献得出了过去忽略和难于解决的答案。对黄崖教案和长清孝里镇旅游资源，也都亲临现场，予以详细的考察。他对于文献的重视也是不惮辛劳的。去年我撰写《大舜传》时，他翻遍了先秦古籍及一些汉代有关著作，详尽地摘取有关大舜的资料，汇为一编，供我参考，惠我良多。仅此一端，可想见他对自己的学业的执着也是如此。常在人们不经意的文献中发现问题，并进行深入探索，以窥其究竟。因此，年末四十，就有多种著作问世，尤其对于齐文化多有创获。这只是他治学的锦绣前程的第一站。齐文化宛如汪洋大海，时下科幻作品曾有“时间隧道”的设想，幻想人类通过此道返回上古去畅游。对于齐文化遗存，也未尝不可设想为返程于古代的时间海洋航道。我祝愿张君乘风破浪，通过时间的海洋航道返回古代的蓬莱三山，撷取齐文化精华之灵菌，以医治当代学术之顽症而造福于社会。

2000年6月8日，时年76岁

目 录

古齐风尚简论	1
《管子》“轻重”诸篇的商战谋略	16
《荀子·议兵篇》浅析	31
秦代的博士与方士	41
秦始皇东巡的原因与动机	64
秦始皇经营琅邪论略	77
齐地八主探析	89
陈乞传	107
陈恒传	117
孟尝君养士得士考论	125

► 齐文化与齐长城

诸葛亮短于将略析论	139
齐长城论略	157
也谈齐长城修筑的时间以及所备御的国家	174
济南境内齐长城考察记	187
齐长城起始区巨防及诸地望变迁考	193
齐长城是如何借助泰山地区地势地利的	203
泰山地区名关要塞述论	209
锦阳关清长城考	225
齐长城沿线的孟姜女传说以及孟姜女庙	229
张积中的黄崖山寨与山寨社会初探 (附录一)	240
黄崖山案与《老残游记》(附录二)	251
长清孝里旅游资源调查及开发的初步设想(附录三)	259
后记	270

古齐风尚简论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封功臣昆弟，分别在泰山南北建立了鲁齐两个殖民据点式的国家。伯禽，姬姓，周人，他建鲁国的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太公，姜姓，东夷人，他建齐国的方针是“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举贤而尚功”（《汉书·地理志》）。建国者不同的族属，不同的方针，决定了东夷人及其文化在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鲁地完全周化，鲁国亦成为周人的国家；齐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东夷文化的传统和习俗，从这一意义上讲，齐国是属于东夷人自己的，“人（夷）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夷人纷纷奔齐而来也能说明这一点。

此后，太公因民俗的遗法被齐国历代当政者所奉守。管仲辅佐桓公，“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莱夷人晏婴更是学无所主，一切本着国情民俗出发，辅佐景公，治国安民，反对用孔子的繁琐礼仪制度来变齐风移齐俗（《史记·孔子世家》）。纂齐的

► 齐文化与齐长城

田氏，本是陈国的落难贵族，自身也有着东夷人的血统，何况他们对太公、桓公又极尽缅怀景仰之至！

然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并不能完全说明风尚生成的问题。

同鲁国所在的土质肥沃灌溉方便的洙泗流域不同，齐国平原狭窄，多盐渍土、沼泽地，难得以农立国。然而齐又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濒海，多渔盐之利；靠山，富林矿之藏。商贾出身的太公自然有识于此。《史记·货殖列传》称：“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太公世家》也说，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行至春秋，桓公大臣如管仲、鲍叔、宁戚等也皆贩夫走卒出身，也皆予工商业以极高的重视。《史记·平准书》载，“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管晏列传》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景公时代，工商业持续发展，而擅权的田氏是那时齐国最大的工商业主。他们“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盐铁论·刺权》）。他们以“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左传·昭公三年》），大斗贷小斗取等手段“行阴德”，收拾民心，为日后代齐作准备。田齐时代，工商业发达繁盛，尤其威宣二王在位时，伴随疆土的拓展，庞大的国内外商业运输网络最终形成：以东西狭长的平原、南北纵伸的谷地河流为交通线，以当时海内最大的消费城市临淄为中心，东以即墨、琅琊，西以陶邑、聊城，南以南阳、薛邑等为商品集散地，车载舟运，往来如梭，齐国的商业活跃繁荣到了极限。

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风尚。齐是以工商立国的，也

是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于世的，因而，齐风尚是典型的工商业风尚。

富，是齐当政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太公“举贤而尚功”。《说文》：“贤，多财也。”《管子·明法》：“功者，安主上也，利万民者也。”“富有涯乎”是桓公人生哲学的主题（《韩非子·说林下》），而管仲更将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据和出发点视为增进个人的利益，满足个人的欲望，倡言“民恶贫贱，我富贵之”（《管子·牧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景公好富自不待言，而晏子虽说过“义，利之本也”，却亦主张“拒欲不道”（《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宣王较姜齐诸君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公开宣称自己“好货”（《孟子·梁惠王下》）。

“主好货，则人贾市”，“上好富，则民死利矣”。工商业的持续繁荣，一切均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富与利成为齐国社会的共同语言，金钱成为齐人追逐的共同目标。工匠相聚，“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商贾相聚，“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盈利），相陈以知贾”（《国语·齐语》）。“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万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管子·禁藏》）。人们无不为了发财致富而奔波而忙碌。而国、聚、邑之诸市则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逐利场所。在那里，销售假足^①、算命占卜^②也成了挣钱的门路，甚至倡伎女乐也成为

① 《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语：“国之诸市，履贱踊贵。”

② 《战国策·齐策一》载：“公孙闲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

► 齐文化与齐长城

公开兜售的商品，桓公为吸引商贾而开设的“宫中七市，女闻七百”（《战国策·东周策》），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妓院。由此可见，太史公《货殖列传》将女色说成是齐地与鱼盐漆丝并重的特产也非为虚妄之辞了。

经商而致富，财大气自粗——苏秦可谓深知齐人。他说临淄“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在这般夸富羞贫的社会氛围中，自然不乏利令智昏、为金钱不惜以身试法的人与事：“齐未亡而庄公冢扞（穿）”（《吕氏春秋·安死》）；齐人欲得金者白昼行窃，“殊不见人，徒见金耳”（《吕氏春秋·去宥》）。

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如同决堤的洪水，冲淡至或淹没了齐人本已淡薄宗法观念，人际关系的一切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契约式的互惠关系，这使齐风尚又具有重功利轻伦理，缺乏人情味的特质。如君臣关系：庆封求崔杼之尸，崔杼家臣说，“与我其拱璧，吾献其枢”（《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又孟尝君失势，三千食客掉臂而去（《史记·孟尝君列传》）。次如师徒关系：东郭敞蓄资买爵，弟子借贷，分文不与，师徒反目为仇（《商君书·徕民》）；寒夜的鲁城门外，为夺取对方的衣服以御寒活命，戎夷与弟子展开舌战，各执一端（《吕氏春秋·长利》）。再如朋友关系，管仲与鲍叔经商，及分财利，行欺诈，“多自与”，不自以为贪。礼制温情脉脉的面纱既已被撕破，家庭关系也不能不受到影响，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个寓言——齐女因东邻男子美而思与之同宿，因西邻男子富而思与之同食——大概不会是好事者凭空虚构的，而齐国两性关系相对混乱的事实尤应值得我们深思。

二

工商业经济的发达不仅使国家也使个人积累了相当量的财富，而个人财富的积累又必定要求有相应的消费水平。这是奢华之风成因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礼制的完备程度。礼制导源于宗法制，其最大的功用在于限定社会各阶层人们衣食住行等消费品的等级分配标准。齐国宗法制以及建构在其上的礼制一向薄弱，而因民俗、顺民欲又是齐国君臣所一贯奉行的治国方略。

当然，历代当政者的倡导亦不容忽视。

论奢侈，桓公、管仲为之先。桓公“闺门之内，般乐奢汰，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荀子·仲尼》）。管仲相桓公，志合言从，“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列子·杨朱》），娶三姓为妇，富拟于公室；“镂簋，朱紘，山节，藻梲”，洙泗“君子以为滥矣”（《礼记·礼器》），孔子以为“其侈逼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而“齐人竟不以为侈”（《管晏列传》）。考诸管仲言行，《管子·侈靡篇》即便不为管仲所著，也足以反映他的以高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

个人的生活习惯以及爱好兴趣只有与社会风尚吻合，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齐人不以管仲为侈，说明齐人高消费的社会心理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早在管桓时代就形成了。《汉书·地理志》说，此后，齐人“其俗弥侈，织作冰绮绣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迨及景公，侈靡之风更甚。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太钟”（《淮南子·要道》）。晏子虽以节俭力行，然而积习难返，“犹恐其（齐人）侈靡而不顾其行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齐文化与齐长城

行至战国，齐“有国者益淫侈”（《史记·孟荀列传》），无不崇奢恶俭。苏秦鼓动湣王“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齐策》），其用意虽“欲破弊齐而为燕”，也只不过是因齐侈靡之风而“利”导之罢了。

高消费的奢华之风由王公当政者发其端，泛滥于最大的消费都市临淄。这座面积达15平方公里的繁华都城，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人们熙来攘往，林立的店铺、旅舍、妓院，喧嚣的市场尘埃飞扬。苏秦描绘道：“临菑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史记·苏秦列传》）淳于髡的描绘更是细致生动：“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史记·滑稽列传》）。

齐城，这座花花世界自然也要强烈吸引着五湖四海的钻营投机的冒险家、寄食谋生的政客学士以及更多的富商鸿贾纷至沓来，接踵而至。他们“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驎黄金然后出”（《管子·地牧》）——齐都成为他们满足物欲奢望的销金窟，这无疑又反过头来刺激了齐人崇侈恶俭之风的节节升级。

虚荣好名与奢侈浮华一母所生。一个尚富重利奢华成风的社会，必定是虚荣好名的社会。《孟子》讲，齐人有贫贱者每日去城东坟地讨食祭物，归家必“骄其妻妾”，夸称刚从富贵人家的宴会上回来。故事读来未免令人捧腹大笑，然而再一想，战国齐都有此人此事又何足为奇！这何尝不是下层市民心理模态的一种表现！贫贱者如此，而富贵贤智有如邹忌、列精子高之流，其“我孰与城北徐公美”的佳话与“东衣缟冠窥于井”的美谈，又不正是士大夫浮华虚饰的生动写照吗！